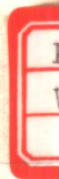


2 刊叢文成

集論究研史臘希代古

編傑俊黃 光任王



王^瑞任光
黃俊傑 編

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035368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

成文叢刊

編 者 王 任 光 黃 俊 傑

發 行 人 黃 成 助

出 版 者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1號12樓

電話：391-6416（5線）

郵政劃撥帳號14447號（全省通用）

印 刷 者 三 文 印 書 館

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巷十九號

電話：3061410，3017762

定 價 新 臺 幣 元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43號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序

王任光

I

「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在西洋學術界是一個很響亮的名詞。因為古典研究的對象是希臘和羅馬的文化，所以從事這項研究工作的人必需具備古希臘文和拉丁文閱讀和欣賞的能力——這在今天的確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了。所以從事古典研究的人往往被人敬為淵博的學者，但亦常被少數人視為食古不化的學究。自十九世紀末以迄於今，研究希臘羅馬古典學問的風氣可謂方興未艾，愈來愈盛；歐美許多大學都有「古典研究」系和研究所的設置，以造就這方面的人才，而有關古典研究的學術性刊物亦不勝枚舉。同時，古典作品，無論是政治的、哲學的、自然科學的、文學的、歷史的，都一一翻譯成各國語文，即以波力比阿斯(Polybius)的「歷史」一書而言，英譯本就有好幾種之多，如「裴頓譯本」(W. R. Pat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New York, 1922-27)；「雪克堡譯本」(E. S. Schuckburgh, 2 Vols., London-New York, 1889; reprint, 1962)；「張伯士譯本」(Mortimer Chambers, Twayne Publisher, Inc. New York, 1966)等，這些都是精心之作，並不如我們市

面上常看到專爲稿費而翻譯的東西，因爲譯本的忠實可靠，今天歐美大學裏研究古典文化幾乎可以不讀原文了；當然，要真正體會出古典文化的精神，讀原文還是十分重要的。

何以歐美學者對希臘羅馬文化有這麼濃厚的興趣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顧一下古典研究的歷史。古典研究的歷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中古時代、文藝復興時代和近代，每一個時代對研究希臘羅馬文化都有不同的目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稱中古爲「黑暗時代」，意即指這個時代的學者不重視希臘羅馬文藝。但事實並非如此。早期的基督教「教父」(Church Fathers，取其以學問、以文章教育教會之意)多是飽學博識之士，對希臘哲學以及形上學的探討有湛深的研究；他們根據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來分析、解釋教會的信仰，使之更合乎理性，而不致有迷信狂妄之譏。以希臘哲學解釋基督教的學術潮流到十三世紀的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達到了顛峯，於是乃有士林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的產生：所謂士林哲學就是希臘哲學和基督教信仰的結合。至於古典語文的研究在中古也沒有終斷，西方四大教父之一的日羅莫(Jerome, C. 340-419)，希臘文和拉丁文兼通，有「基督教人文學者」(Christian humanist)或「基督教西塞羅」(Christian Cicero)之美稱。其他早期教父如如斯丁(Justin, 100?-165)、格來孟(Titus Flavius Clemens, 150?-220?)、戴托良(Tertullian, 160-230?)、奧利堅(Origen, 185?-254?)等，都是精通希臘或拉丁語文的學者。此後，修道院學校(Monastic Schools)和主教座堂學校(Cathedral Schools)繼續古典研究的傳統，遂有「加羅林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鄂圖文藝復興」(Ottonian Renaissance)、「十二世紀文藝復興」(The Twelfth Century Renaissance)等之出現。可見古典文藝的研究

，並沒有像十四、十五世紀人文學者所說的完全沉沒，而有待他們來「復興」。不過，中古學者之研究古典文藝自有其特殊目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借用「外教學問」(Pagan learning)來闡明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古典研究是一種工具，而非是目的。換言之，中古學者將古典文藝「神化」了，使它成為達到超自然目的的一座橋樑。中古的古典研究和以後文藝復興時代的古典研究，在目的上和態度上雖有不同，但在研究結果上則並無區別。換言之，中古學者開創了古典研究的風氣，使後來學者在這方面能够繼續不懈，給西洋學術界樹立了一個可喜的傳統。

可是，十四、十五世紀的人文學者對這種說法是不會承認的。人文學者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薄伽邱(Giovanni Boccaccio)、費拉尼(Filippo Villani)或皮翁道(Flavio Biondo)等，都認為在他們的時代古典文藝才再度復興，因此乃有「黑暗中古」(佩脫拉克)、「千年中古」(皮翁道)等名稱的出現，這班人文學者研究古典文藝的態度，消極方面，他們反對當時的學術風氣，亦即是士林哲學之把持學術界。他們認為士林學者對古典語文的形式漠不關心，致使當時的拉丁文「土」、「俗」、「野」三字兼而有之；同時，士林學者雖然探討古人如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但僅限於來解釋基督教教義，而沒有深入作全盤的研究。因此，人文學者就先在文字上下手，極力摹倣古人，研究古典語文成為他們的目的。他們的工作並不止於此。他們更進而追求古人的思想，企圖將這些思想適應到當代的社會。他們一方面將古典研究從和基督教信仰的從屬關係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想將古代的「人本」思想復興過來，這就是所謂「人文主義」——以人為本的思想。可惜他們太過份強調「復古」，他們在文字上極力摹倣古人，因而將拉丁文帶上了死亡的道路。他們有意恢復古代的政治制度，却不知道時代不同

，舊制不適合新生活，di Rienzi 的嘗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三四七年，他宣告在羅馬組織「善良政府」(buono stato)，一切制度儀式均遵古禮，自稱「護民官」，大有恢復古羅馬共和的雄心，但不到七月(一三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即告失敗。人文學者以復古的精神來研究古典文藝雖告失敗，但在古籍的搜集、考訂、整理等工作上則功不可沒。同時，他們以入世的精神來處理古典文物，使古典研究從神學解放出來，逐漸走上獨立的研究道路，厥功至偉，尤值稱揚。

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在史學上，揭開了「歷史連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理論，給古典研究提示了新的——也是正確的——態度。根據這個「歷史哲學」，人類歷史的發展是有連續的；這一代的歷史受到前一代歷史的影響，同時亦影響到下一代的歷史；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所謂完全孤立的階段。近代學者研究古典時代即本於這種理論。希臘和羅馬可以說是西洋歷史發展的源頭，所以近代學者之從事古典研究，不在復古，而在探討其對西洋文化的影響；研究的範圍不限於文字的事，而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宗教、文藝等多方面的挖掘——地上和地下文獻的挖掘，這才是古典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這也正好為前文所提「何以歐美學者對希臘羅馬文化有這麼濃厚興趣」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其實這同時也答覆了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歷史這個問題。

綜上所述，「古典研究」原是西洋學術史上的傳統，並不從近代開始。歷代學者研究希臘羅馬文化，在精神和態度上，雖有不同；但他們努力耕耘，所以有豐碩的收穫，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景仰的。

我國學校之有西洋史課程，爲時不可謂不久〔註〕；大學歷史系課程裏，西洋史亦佔有相當重的份量，而在西洋史課程中亦列有「西洋上古史」、「希臘史」或「羅馬史」。可是，大家對西洋史似乎並不注意。據統計，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五三年，中國留美學生有資料可查者共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學工程者有九千另二十三人，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學歷史者僅一千一百一十二人，佔百分之三點五，其中專攻西洋史者（包括美國史）爲數極少。（見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p. 511）此外，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六〇年，中國留美學生文科之博士論文多屬中國史，約佔百分之七十弱。（見周法高「漢學論集」，頁九十四。民國六十一年正中書局）。讀西洋史的人少，專攻西洋近代史以上如希臘羅馬史、中古史、文藝復興史的更少，而專攻西洋某一思想或制度的更是寥寥無幾了。我們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物應該注意自不在話下，但時至今日，中西文化的交流乃勢所必然之事；我們不該放棄我們自己好的傳統，但亦不該盲目地隨便採取西方的一切，我們必需做明智的選擇。要做明智的選擇，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傳統就不能不先有一個深入的瞭解，這種工作，是應該由許多學者分工合作、共同來完成的，我們攻讀西洋歷史的人自亦責無旁貸，來貢獻一部份的力量。因此，研究西洋史在我們的學術界裏應有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可是，大學裏有關西洋史方面圖書和學報的缺乏，學術論文之少見，在在都顯示我們對西洋史研究的忽視。有關西洋史書籍方面，除高亞偉、李邁先、王曾才諸先生的作品外，其他亦僅有一、二本外國教科書的翻譯。最近臺北地球出版社在陸續出版一套世界文明史，我被邀爲審訂委員之一，已審畢「羅

馬帝國」一冊，還要我再審訂文藝復興。根據我看到的「羅馬帝國」，我認為內容充實，圖片豐富，將是一本好書。但我有一個很慚愧的感想，「羅馬帝國」是日本學者所寫，從日文譯過來的，這對我們的西洋史研究來說真是一個諷刺，也是一個挑戰。如果「羅馬帝國」是譯自歐美學者的作品，我自然沒有話可說；但這是從日本作品譯過來的，我們真應該感到慚愧，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資格寫！希望我們不僅止於慚愧，應該起而迎接這項學術挑戰。

我們應該怎樣來迎戰呢？我認為有兩方面我們應該做的，一是西洋知識之中文文化，二是中西思想制度的比較觀。先來說說西洋知識之中文文化。所謂「中文文化」，就是用中文介紹西洋知識；就歷史方面來說，我們應該用中文先譯歐美學者的歷史作品，而後乃着書立論發表我們中國人對西洋歷史演變的看法。有人認為，能够讀原文，何必讀譯文？哲學界前輩陳康教授在其譯「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序文裏已替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他說：「無問題的，翻譯是爲了不解原文的人的，然而不只是爲了不解原文的人的；反之，在學術方面有價值的翻譯同時是了解原文的人所不可少的。」他提出兩個理由：一是校勘古籍，權威性的翻譯有很大的幫助；二是譯者不同的看法可以幫助了解原文。陳康先生抱着很大的希望說：「現在或將來如若這個編譯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裏的產品有能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爲恨（這決非原則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爲！）甚至因此欲學習中文，那時中國人在學說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着於全世界。」顯然地，陳康教授這篇寫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的序中所提出的希望，到今天還沒有實現。

就西洋史研究而言，我們不應該再漫無計劃地亂翻譯，或者翻譯一些教科書之類的東西。我主張應

該譯的可以分三大類，同時進行。第一是原始史料，如希羅多德、修西底斯、波力比阿斯、凱撒、李維、泰西塔斯、歐塞比(Eusebius Pamphilus, c.260-c.340)、都爾主教格列哥里(Gregory of Tours 533-594)、可敬比得(The Venerable Bede, 672-735)等許多作品；第二是二手資料，却是經典之作，它們代表一個時代的思想，雖然我們並不能完全同意其看法。這一類的書如吉朋(Edward Gibbon 173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毛森(Theodore Mommsen, 1817~1903)的「羅馬史」、蒲耳卡(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希臘文化史」和「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化」、服爾德的「列國習俗與精神論」等；第三是近人的著作如 J.B. Bury, Cyril E. Robinson, H.D.F. Kitto, T.R. Glover, H. Pirenne 等。上述三大類中如已有好的中譯本，可以加以保存，不好的則予以重譯，分類自成一套，總屬於「西洋史叢書」。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需要大家的合作。

有了重要史籍的中文譯本作爲西洋史研究的基礎後，我們應該從事著作，以中國人的觀點，根據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對西洋思想和制度作獨立的分析、解釋和批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先應該做到我上面所提出的比較中西的思想和制度。縱然中西文化的發展有不同的源頭、環境和路線，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必然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同」，何以同；「異」，何以異，其中必有道理。如果我們能夠說出其中道理，那末陳康教授「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爲恨」的希望就會逐漸實現了。當我負責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時，曾敦請前輩沈剛伯先生授「中西古代文化之比較」一課，其目的即在於此。

三

爲了逐漸實現上述的理想，我們嘗試作一個小小的起步。臺大歷史系黃俊傑先生和我編集了這本書，題名「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本書是有關希臘史的論文集，大部份是譯文（慚愧得很，其中一篇是從日文譯過來的），小部份則是國人的作品。各文內容以及全書的結構，黃俊傑先生在「導論」中已言之甚詳，我不再贅言。我說這是一個「起步」，因爲我們希望以後能陸續刊出類似的論文集，以提高西洋史教學和研究的興趣；而最後的目標則是西洋知識之中文化和獨立作品的出現。

最後，我必需感謝所有的譯者和作者。輔仁大學歷史系涂秋芳小姐亦曾參與其事，本書十三、十四、十七三篇譯文均曾經她修訂過；今已作古，人天永隔，思之撫然。

王任光寓於臺大歷史系

六十七年二月二日

註：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京師大學堂設「仕學館」與「師範館」。仕學館之歷史課程中，「外國典章制度」與「考中外治亂盛衰之故」，每週各三小時。師範館則有「外國上世史、中世史」，每週二小時；「外國近世史」，每週三小時；「外國今世史及歷史教學法」，每週二小時。（參考：莊吉發著「京師大學堂」，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第三十三號，民國五十九年。）

目次

序.....	王任光.....	一
導論：		
古代希臘史的特質.....	黃俊傑.....	一
一、綜論篇		
一、西洋上古史的範圍.....	<i>Hermann Bengtson</i> 著 黃俊傑 譯.....	四一
二、地中海世界概論.....	太田秀通 著 高明士 譯.....	四六
二、思想篇		
三、宗教信仰在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上的重要性.....	<i>N. D. Frustel de Coulanges</i> 著 李宗侗 譯.....	六五
四、「希臘歷史思想」緒言.....	<i>Arnold J. Toynbee</i> 著 李恩函 譯.....	八六
五、希臘歷史寫作的起源地——愛奧尼亞.....	<i>J. B. Bury</i> 著 王任光 譯.....	一〇三

六、希臘多德及其「波希戰史」.....李弘祺 著...一二三

七、西洋史學史上的希臘多德.....A. D. Momigliano 著
葉琳 譯...一四三

八、「波希戰史」的史料問題.....李美月 著...一六〇

九、修西的底斯的史學.....梁立文 著...一七七

十、修西的底斯與雅典民主政治.....David Grene 著
黃俊傑 譯...一〇一

十一、波力比阿斯的史學.....王任光 著...二〇八

十二、一位希臘史家眼中的羅馬政治體制.....王任光 著...二四七

三、制度篇

十三、希臘城邦的興起.....H. D. F. Killo 著
戴似玉 等譯...二六七

十四、希臘城邦的成長.....F. E. Adcock 著
陳美森 等節譯...二八〇

十五、雅典城邦的市民生活.....Mabel Lang 著
黃俊傑 節譯...二九六

十六、伯里克里斯時代雅典的城邦政治與私人生活的關係 *W. S. Ferguson* 著 劉必達譯 三〇八

十七、希臘城邦的衰落 *H. D. F. Kitto* 著 黃嫩心等譯 三一〇

十八、亞歷山大帝國的行政 *E. Badian* 著 何宛倩譯 三三八

十九、亞歷山大的治道與將道 *J. F. C. Fuller* 著 紐先鍾譯 三五六

附 錄

古代希臘史研究書目解題 *C. G. Thomas* 著 黃俊傑譯 三九五

導論：古代希臘史的特質

黃俊傑

一

在整個西洋文化史上，古代史別佔畛域，居於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自文藝復興時代以降，希臘羅馬古典一直成為學者鑽研爬梳的重要領域。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如佩托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6)、薄伽邱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及德桑布里奧 (Pier Candido Decembrio) 等人對希臘羅馬古典均耳熟能詳，而著名的商人西利阿柯 (Ciriaco, B.C. 1455) 遨遊於地中海東部及愛琴海沿岸以蒐集古希臘石碑，更可視為發掘特洛城及邁錫尼舊址的許萊門 (Heinrich Schliemann, 1882-1890) 的前驅者。(註一) 洎乎近代，學者對希臘羅馬古典之研究尤方興未艾，經歐陸及英美諸大家之耕耘，古典學研究乃寢寢乎蔚為大國，自成一獨特之學門矣。時至今日，不僅希臘羅馬古史研究之專業性學報指不勝屈，(註二) 即以收錄世界各國有關古典學研究書目之定期刊物 *L'année philologique* 而言，每期僅列書目即已洋洋大觀，令人嘆為觀止矣。

西洋古典學的研究之所以蔚為近代西方學界之一種獨特學門，其原因當然與文藝復興時代以及近代

人對古典文化精神的孺慕之情有關。遠之如李安佐 (Cola di Rienzo, 1313-1354) 以希臘古典爲他自
己時代政治之指針；馬其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以羅馬帝國衰亡之史實爲他所處的時
代衰亡之鏡鑑；近之如美國獨立革命時期十三州人士以希臘羅馬時代之共和政治之史實爲其獨立革命之
理論根據，(註三)都是重要的例子。吾國古人所謂：「書不讀秦漢以下，志在山水之間。」這種對於
古典文化的孺慕心情，東西雙方皆有相似的現象。然則，古典學術研究之所以重要，尙有一層更重要的
學術理由在。此卽是古代這一段是整個西洋文化史的形成期，對此後歷史之發展具有開宗立範之作用，
亦有極爲深遠的影響，此於古代希臘史爲尤然。

古代希臘史在西洋文化史上開宗立範的重要性至少可就兩方面觀之。就政治制度史之立場言，人類
史上所曾出現過之政治體制，舉凡王政、貴族政治、王政與貴族政治之混合政體、僭主政治、寡頭政治
、民主政治……等皆曾出現於古希臘城邦之政治生活之中。希臘城邦之政治經驗實可說是開創了人類政
治生活之典範，大多數的政治體制皆可於古希臘覓其不祧之祖。就中尤以民主政治對近代西方人影響最
大，殆可視之爲古希臘人留予近代西方人之一項重要文化遺產。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中所見之重大原則，
諸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多數人統治」以及「個人自由」等理想皆已表現於西元前四三一年雅典
政治家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d. 429 B.C.) 的葬禮演說辭之中，(註四)亦具體落實於西元前五世紀
雅典所實施之陶片流放制 (Ostracism) (註五)及抽籤任官制之上；就思想史之立場言，懷德海 (A.
N. Whitehead, 1861-1947) 所謂：「對歐洲哲學傳統最好的描寫就是說它是柏拉圖思想的註腳」這
一句名言最能刻劃出古希臘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當代研究思想史的大師羅孚若 (A.O. Love-

ejoy, 1873-1962), 就會追溯柏拉圖思想中「現世的」與「來世的」兩個「單位觀念」(unit ideas)在整個西洋思想史上不同時代的展現過程(註六)。希臘思想傳統在西洋文化史上實具典範之地位。中古歐洲文化之淵源有三：曰希臘羅馬傳統；曰日耳曼人之活動；曰基督教之領導。中古文化實可定義為：「在基督教領導下，日耳曼人在希臘羅馬傳統上所建立的文化」(註七)。希臘傳統在中古文化之重要性不可言喻，而文藝復興時代柏拉圖哲學之復興尤係重要之史實(註八)。在希臘思想傳統中，最值得吾人注意者殆為其人文主義之精神。

然則，古代希臘思想中人文精神之昂揚亦非自始即然。早期希臘哲學家如泰里斯(Thales, fl. 580B.C.)、亞那克錫曼德(Anaximander, c. 610 B.C.)，以及赫拉克利塔斯(Heracitus)皆視宇宙為物，彼所殫精以思之對象在物不在人，此種重物之哲學趨勢通貫於古希臘之宗教、道德、政治、文藝等各方面之活動，當代中國哲人方東美先生稱此種宇宙觀為「物格化的宇宙觀」(註九)，最能言其精蘊。但遠乎西元前五世紀，思潮為之一變，相對於前此的重物思想的一種反動思潮逐漸胎動(註十)，古希臘德爾斐(Delphi)神廟上的刻辭「瞭解你自己」(“Know Thyself” gnothi seauton)一詞至此取得了嶄新的意義：瞭解你是一個人而不是神的隨從。人本身至此而成為探討研究的對象，人的理性逐漸曙光，神的指引漸漸退居次要，宇宙開創論、宇宙論在哲學上盡失其重要性，人成為思想之中心。吾國古籍所謂：「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一語頗可用來形容希臘思想中此種天人消長物我嬗遞之歷程。

西元前五世紀希臘人文精神之胎動首見於理性醫學之興起，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約生於西元前四六〇年)在其故鄉柯斯(Cos)建立一個醫學院，此後醫學之書籍大量出現，希氏及其學派所